

第一章 明代漠南蒙古的形成

一．蒙古南迁之前的漠南地区

在元代，蒙古人大多数居于岭北行省，元代岭北行省大体包括西起金山（今阿尔泰山），东到哈刺温山（今大兴安岭），南临大戈壁的广大地区。其中西至金山，东到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游与东道诸牧地相接的地区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封地；怯绿连河、斡难河中下游、东南至哈刺温山（今大兴安岭）中段东西地带是元太祖成吉思汗诸弟东道诸王的封地；其西面金山周围地带是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封地。

在漠南地区也分布着许多蒙古部落，元代辽阳行省境内有元太祖弟铁木格斡赤斤及弘吉剌、亦乞列思、扎刺亦儿、兀鲁兀、忙兀等五投下的封地。在中书省境内，泰宁路是斡赤斤后裔辽王的封地，宁昌路是亦乞列思部驸马的封地，全宁路是弘吉剌部驸马的封地，其地包括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镇）、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达来诺尔西南约二公里）二城在内的西拉木伦河一带地区。在上都路分布着云需府牧群和鹰户等。阴山以北的德宁路、净州路（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达茂旗一带）是汪古部的封地。黄河河套内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的封地，元末设察罕脑儿宣慰司管理其地。套西的永昌路是窝阔

台子阔端的封地，后设永昌等处宣慰司元帅府管理其地。在其南部，今青海省东南和甘肃省的部分地区是忽必烈子镇西武靖王奥鲁赤和驸马岐王的封地^①。而明初与北元的战争迅速改变了蒙古族的这种分布状况。

明洪武元年(1368)七月，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结束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顺帝率朝臣百官退居漠南的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闪电河北岸)。这时元朝除据有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之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等地主武装还控制着陕西行省及中书行省的西部(即今山西省)地区，在西南云南行省仍奉北元正朔。因此，元顺帝不甘心失败，在上都与臣僚日夜谋划“恢复大计”，企图恢复旧疆重返中原。但是，由于元廷和地主武装内部存在矛盾，互相很难配合，在明军的强大攻势之下，迅速被各个击破。明军攻克大都后，挥师西进冀宁路，击败扩廓帖木儿于太原，扩廓帖木儿退守甘肃，明军据有今山西地区。第二年，明军西征陕西、甘肃，迫降李思齐十万余众于临洮。又击败张良弼之弟张良臣于庆阳，占据了陕西行省及甘肃南部。与此同时，在东部击退了北元对北平、大同的进攻，并乘胜北袭上都，迫使元廷再迁应昌。洪武三年(1370)正月，明军再次发动北征。兵分两路：大将军徐达出兵甘肃，在定西(今安西)沈儿峪大败北元军主力扩廓帖木儿部，获其将校军卒八万多人。左副将军李文忠率偏师北上袭击元廷。五月初，李文忠军至上都，获悉元顺帝于四月末病逝于应昌，遂率军急袭，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自应昌仓促逃往漠北，明军俘其妻及幼子买的礼巴剌。这次北征，明军攻占了陕西行省和甘肃行省南部，扫荡了漠南上都、应昌及小凌河一带。

^① 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第八章；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册，第六章第九节。

漠南蒙古各部，在明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招抚下纷纷降明。七、八月间，封地在今甘肃省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的驸马高昌王和尚、岐王桑哥多尔只、镇西武靖王卜刺纳等以所部降明，明朝以其部设立了高昌、岐山、武靖等三卫，以和尚等人为指挥同知等官。元参政脱火赤自忙忽滩遣使降明，明置忙忽军民千户所隶绥德卫，其地在河套内。九月，元宗王扎木赤自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山北）降明，明朝置官山等处千户所。洪武四年正月，北元枢密院官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来降，明设失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斤、翁吉刺等五千户所。二月，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金、复、海、盖等州郡降明。四月，汪古部赵王汪古图亦率部降明。这样明军控制了漠南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甘肃行省北部及中书省全宁路、大宁路等地仍然掌握在北元手中。

爰猷识理达腊北走后，以扩廓帖木儿为相，笼络一部分汉族地主武装头目和知识分子试图东山再起。洪武四年（1371），建年号“宣光”，立意仿效周宣王姬静和汉光武帝刘秀重兴大元。明太祖朱元璋则深以为忧，为彻底摧毁北元政权，“永清沙漠”，决定再次发动北征。洪武五年正月，明太祖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十五万大军，分三路北征。其中西路明军扫荡了北元甘肃行省，颇有收获，但是中路主力军和东路军深入岭北腹地后受挫，伤亡很大，因此纷纷败退。北元军则乘胜南下，不断袭击明朝沿边城寨。在明朝边境的东面，进攻永平、迁安、抚宁（以上皆在今河北省东北境内）以及瑞州（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等地；北面接连攻击明朝在今山西境内的武州（神池东北）、朔州（今朔县）、崞岚、雁门（今代县北）、忻州（今忻县）以及今河北境内的蔚州（今蔚县）、弘州（今阳原）、怀柔等地；西北，进犯今甘肃境内的庆阳、会宁、河州（今临夏）、兰州及今陕西境内的保安（今志丹县）。北元重新进入漠南地区，占据了兴和（今河北张北县）、亦集乃（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等地。明朝此

前以北元降众所设卫所，或内迁，或重归北元。明朝命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将领往北平山西等处率军备边。由于北元的力量相对弱小，没有进一步深入，但是明太祖不得不暂时放弃统一漠北的打算。岭北之役后，朱元璋致书爱猷识理达腊，劝其顺从天命放弃中兴之念，“君主沙漠，朕主中原”，双方相安而处。洪武七年（1374）明朝主动遣使送还爱猷识理达腊在应昌遗下的幼子买的礼巴刺，由于双方均无力大举征伐，南北对峙局面形成。

自岭北之役后到洪武二十年明军迫降辽阳纳哈出期间，明朝与北元处于对峙状态。双方的疆界如果以洪武十年为标准年代，则大体如下：在今辽河以东，东自双城（今朝鲜永兴）向西北经鸭绿江与婆猪江（今浑江）汇流处，由此向西，以辉发河、浑河为界，此线迤南为明朝的控制区；向西以浑河汇入辽河处以南的下游辽河为界。在辽河以西，明朝设防于山海关一带，其控制范围大致在小凌河上游到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向西北至上都一线迤南。正北的控制区到了大青山、阴山、黄河河套北，在河套西面则沿河西走廊向西北至嘉峪关。

在此期间，双方在漠南爆发了几次冲突。北元军队几次袭击明朝永平、迁安等地，迫使明廷将瑞州和抚宁县的治所内移。由于北元盘踞大宁、高州、红罗山、全宁一带，严重威胁明边，因此明军对该地区发动了几次袭击。洪武七年（1374）出兵红罗山、锦川（小凌河上游）一带，获北元达鲁花赤王歹都等三十余人及其部民三千余口。同年，明将李文忠率师攻克大宁、高州、大石崖，斩元宗王朵朵失里，擒翰林院承旨百家奴，又遣指挥唐某至毡帽山，遇故元鲁王营于山下，以兵围之，斩鲁王等，获其妃蒙哥颍，并金印、玉图书等物。十四年（1381），大将军徐达率诸将出塞，右副将军傅友德至北潢河，击走北元部众。又选轻骑夜袭灰山，获部众人畜甚众。西平侯沐英等攻公主山长寨获全

宁四部以归。北潢河即今西拉木伦河，明军接连几次袭击了元驸马鲁王部落。和田清先生认为全宁四部即弘吉刺、亦乞列思、兀鲁兀、忙兀四投下部落。在西北，明军袭击亦集乃、哈密；在辽东，明军不断经略女真地区，最终于洪武十七年切断了北元与高丽之间的交通线。高丽被迫归附明朝，这样明朝出击北元的时机成熟。

洪武二十年（1387），明朝出兵辽东，迫降了北元辽阳行省左丞相纳哈出所部。第二年又派遣蓝玉率军袭击北元汗庭于捕鱼儿海（今内蒙呼伦贝尔盟贝尔湖），脱古思帖木儿汗仓促西逃土刺河（今蒙古国境内土拉河），结果被元世祖忽必烈弟阿里不哥后王也速迭儿杀死。也速迭儿在瓦剌贵族的支持下篡位称汗，北元政权陷入分裂。同年，原居辽阳行省北部的辽王阿扎失里等宗王官率军民遣使降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设泰宁、福余、朵颜等三卫，以阿扎失里等人为各卫首领，命其仍居故地，这样明朝完全控制了漠南地区^①。

捕鱼儿海之役后，明太祖为巩固胜利成果，加强北部边防，再次派遣诸子出镇北方。此前，于洪武十一年（1378）已派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又命燕王就藩北平。捕鱼儿海之役后，又先后命庆王就藩宁夏，宁王就藩大宁，谷王就藩宣府，韩王就藩开原。又改封豫王为代王，就藩大同，汉王改封肃王，就藩甘州，卫王改封辽王，就藩广宁^②。还在东自辽东，西至甘肃的沿边地区增设了大量的卫所，令军卒屯田自给。洪武三

① 有关北元初期史实的叙述请参见拙文《北元初期史实略述》和《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分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和《蒙古史研究》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参见《明史》第116—118页，《诸王列传》

十年(1397)正月,明太祖“以宁王,辽王各据沿边草场牧放孳畜,乃图西北沿边地里示之。敕之曰:‘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又东至鸭绿江,又北去不止几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又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山海卫外,凡军民屯种地不许牧放孳畜’……。”^①从这段话可以大体窥见当时明朝的北边防御体系,明军防线已向北推移,形成了内外二道防线,两道防线内军民屯种,空旷地则牧放马匹。明警戒和巡逻范围可能包括了整个漠南地区。捕鱼儿海之役后,明军还几次遣军深入漠北。洪武二十三年(1390),燕王率兵至迤都(清代达里岗牧场境内),降元将乃尔不花;二十五年(1392),明将周兴率兵远至斡难河(今鄂嫩河),兀尔古扎河(今乌勒吉河)及彻彻儿山(今内蒙古哈拉哈河上游一带)^②;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燕王再次率军至彻彻儿山。但是,没有遇到大量的蒙古人,显然脱古思帖木儿汗败亡之后,北元政治中心西移,东部各部受明军威胁而西迁,或者更向北迁徙住牧。

明太祖死后,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争战,燕王朱棣夺取了皇位。这场战争使北方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正如明成祖所言:“往者连年军旅,北方之民供给劳苦,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③而且在战争中燕王尽拔大宁及北平都司各卫之兵投入战斗,诸卫所为之一空,北部防御设施亦破坏殆尽。至战争结束时,北元势力已经得到恢复,并对明朝构成威胁。明成祖即位后立即着手恢复沿边卫所,收集逃亡,恢复屯

①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年正月庚辰条。

② 同上,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癸巳条,二十五年八月庚申条。

③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四月丁卯条。

田。如战争期间原东宁卫士卒及其家属近二万多户逃入朝鲜，明成祖命朝鲜遣还了绝大部分逃人^①。永乐二年（1404）四月，又令朝鲜选送耕牛一万头于辽东，海运布帛以偿其值^②，使辽东屯田得以恢复，城堡得以修葺。而大宁诸卫废弃已久，城垣颓毁，一时难以恢复，再者大宁一带在地理上孤远，很难与整个防线连成一气，即使恢复，由于粮饷运输困难，也难持久；除此之外明成祖有意撤藩，故将宁王改封于南昌，移大宁都司于保定，收缩了防线。而在渤海沿岸地区设立广宁等卫以保证北平都司与辽东的陆路联系。永乐年间的北部防线，除开平一处之外，基本上都是沿洪武年间的内道防线设防。这道防线大多是依山险在隘口处修建墩台、城堡而守之，并开始大量修筑边墙（长城）。

明成祖在恢复和加强边防守御的同时遣使招谕女真、兀良哈诸部，以其首领为指挥、同知等官，建立卫所，使东北地区尽入明朝的势力范围。又招降哈密，以元裔为忠顺王控制中西交通；遣使西域诸国，直至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向南又派遣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开疆辟土雄心勃勃。他还想乘北元立足未稳之际，以其靖难之精锐一举消灭北元政权。永乐七年（1409）七月，命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骑十万袭击北元汗庭于克鲁伦河中下游一带，结果却全军覆没。此后明成祖五次亲征，史称“五出三犁”，虽然未能达到其彻底摧毁北元政权的目的，但是给北元造成很大的军事压力，使其不敢南牧，更不敢定居漠南，终永乐朝“虏不敢近边”。这种“漠南无王庭”的局面保障了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全。但是，自明宣德年间开始蒙古部落开始南迁，至嘉靖末年最

① 参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第173页、第183页。

② 同上，第199-205页；又见《明太祖实录》，永乐二年六月辛卯条。

终形成了漠南蒙古各部。其中经历了兀良哈三卫南徙、北虏入套、左翼蒙古南迁这样三个阶段，试依次分述如后。

二. 兀良哈三卫的南迁

(一) 关于明成祖“弃大宁予兀良哈”之说

明代统称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为兀良哈三卫或朵颜三卫，对三卫的来源以及最初的分布情况，日本学者和田清先生曾作过详细的研究。他已考证三卫的前身分别就是元代的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台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和灰亦儿等处怯怜口千户所，他们的住地基本都在元辽王的封地内。洪武二十一年（1388）脱古思帖木儿汗遇弑后，以上诸部在辽王阿扎失里率领下遣使降明，明封辽王阿扎失里为泰宁卫指挥，封朵颜元帅府（此时已由千户所升为元帅府）首领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封海撒男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各领所部，以安畜牧”。但是，三卫建立不久又叛归北元新汗。洪武二十四年（1391）四月，明朝派遣傅友德、郭英率军讨伐辽王阿扎失里于洮儿河一带，这样三卫与明朝的关系中断^①。

兀良哈三卫与明朝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始于永乐朝。建文四年（1402），明成祖即位后派人去招抚兀良哈三卫，永乐元年（1403）五月再次遣使，逾年三卫遣使来贡。明廷“命脱儿火察（即脱鲁忽察儿）为左军都督佥事，哈儿（兀）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安出及土不申俱为都指挥佥事，掌福余卫事；忽刺

^① 参见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 90 至 124 页

班胡为都指挥僉事，掌泰宁卫事；余及所举未至者总三百五十七人，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及白金、钞币、裘衣”^①。这次重建的兀良哈三卫以朵颜卫为首，泰宁卫降至最末。由于朵颜卫是由兀良哈人组成，故明人以朵颜卫的族别统称其为兀良哈三卫。对三卫的住牧地，明后期人认为自永乐年间开始其分布就是“东起广宁前屯，立（历）喜峰近宣府为朵颜，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为福余，由锦、义渡辽河至白云山为大宁”^②。这主要是受当时私人著述中出现的所谓明成祖“弃大宁予兀良哈”之说的影响。和田清先生对这种误解作了批驳，经过详细的考证，他认为上述的分布是明中后期的情况。在明初，三卫的游牧地远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之北，其中泰宁卫牧地在元泰州（今吉林省洮安县）一带；朵颜卫在额克多延温都儿（今内蒙古扎赉特旗北），棚儿河（今内蒙古兴安盟境内绰尔河，和田清认为即今洮儿河上游支流乌兰灰河）一带；福余卫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的瑚裕尔河流域；南迁明蓟辽边外住牧是明中期以后之事^③。这是正确的。所谓明成祖弃大宁予兀良哈之说的主要依据，就是认为燕王朱棣于靖难之役借兵于兀良哈三卫，即位后为报答三卫，移大宁卫于保定，以其地给予兀良哈。这个说法至少始于马文升的《抚安东夷记》，郑晓、王世贞、杨守谦等人的著作则沿袭其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实际上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明代就有人提出异议。如郭造卿在明万历年间就曾对此观点批驳道：

“今言大宁者率谓我成祖以畀兀良哈，盖未之考耳，当宁藩既袭，环卫有其故种，藉为先驱及顺戍卒归情耳，未尝尽驱三卫

①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四月乙丑条。

② 郑晓：《吾学编》卷 67，《兀良哈》。

③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 90 至 124 页。

以行也。靖难来朝，仍设卫如故，诏其镇守边境世居本土，曷尝以大宁界乎？无论永乐壬寅师，即宣德之东狩，其巢穴非我故藩可考焉。但营兴诸卫既移，其贡道必由此行，我之烧荒日近，彼逐水草居，逐渐牟而有之耳。若谓以大宁与三卫，则其二皆有分地，岂自屏广宁外岁借路于朵颜哉？故鸣銮镇戍之谕灭虏而守大宁者，非既界而复背之，本我地而我守之耳。乃犁庭甫毕而榆木变作，经略未遑，固宜永叹，所可憾者，宣德辅臣远弃安南，近弃开平，当英武之朝不能赞成先志，喜峰凯旋而已矣。三卫永若河套谁之咎欤？”

他接着说“自宣德后大驾不征，正统后大师无成国（朱勇）之出塞，景泰后大臣无肃愍（于谦）之经略，则《天顺一统志》后有界地予夷说矣。”^①其说非常精辟，不仅批驳了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而且道出了三卫南迁的原因。对放弃大宁一事，顾炎武认为：

“大宁初设，未有民人，但立北平行都指挥使及大宁、营州、兴州、会州等一十六卫，自燕王拔而南，遂为空城。及转战三年始下南京，而大宁已弃之后不能复置，因徙卫于山南。”^②

和田清对此颇为赞同，我也认为这是放弃大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除了大宁一时难以恢复之外，还有战略上的原因。此前已述，大宁的地理位置偏远，孤悬边外，与辽东和开平都有山岭阻隔，很难与其他卫所连成一气，不易防守，而且道路遥远，粮饷运输困难，故明成祖收缩防线，放弃了大宁。这与后来放弃开平的情形大体相同。

贾敬颜先生曾根据蒙古文史籍的有关记载认为“界地”虽属

① 郭造卿：《卢龙塞略》卷 8，《洪宣正景经略》；茅元仪：《武备志》卷 229（朵颜三卫考）

②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

于冤案，但是“借兵”确有其事^①。我认为蒙古文史籍中诸如明成祖是元顺帝遗腹子，乌济业特（üjijet）部助兵燕王夺位等记载皆系传闻，不能轻信，靖难之役在双方的营垒中都有蒙古兵是事实，但是这些蒙古人都是洪武年间在明与北元战争中被俘或归降者。我们知道仅洪武二十年、二十一年两次战役中蒙古人被俘者就有数十万人，他们分别被安置于南、北方各卫所中。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七月，“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以故元降将阿速为大宁前卫指挥僉事，沙不丁为大宁后卫指挥僉事，仍领所部将校……。”^②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命五军都督府以乃尔不花所领土马於北平都指挥使司点阅，遣往沙漠为边候（墩）。其真州、扬州、淮安、邳、徐所属鞑靼军士，有家属者，令千、百户率赴北平编伍，听今上（即明成祖）调用”^③。乃尔不花，洪武八年（1375）归附，明设官山卫，以其为首领，第二年叛走。二十三年（1390）燕王朱棣率兵至迤都再次收降，安排于北方^④。二十六年三月，明太祖嘱咐燕王“旧降胡兵，非出征不可轻纵，恐盗马潜遁，阴泄事机，所系甚重。若欲用以御敌，常使参错为伍，庶几无虑（虞）……。”^⑤在燕王及其他藩王手下都有大量的蒙古人充当护卫或家丁。《明史》有传的蒙古人薛斌、薛贵、李贤、吴成、滕定、

① 参见贾敬颜师：《明成祖割地兀良哈考辨》一文，载《蒙古史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②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七月甲申条、庚寅条。

③ 同上，洪武二十五年二月乙丑条。

④ 同上，洪武八年三月戊子条，九年三月己酉条，二十三年三月，又参见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2，第28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版。

⑤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乙卯条。

毛胜等人都是在燕王麾下参加靖难之役而获功的蒙古人^①，而不是三卫之人。前已述及兀良哈三卫早在初建卫所的第二年就已叛走，并受到明军征讨。如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遣使谴责三卫头目时也追述说：“昔兀良哈之众数为鞑靼抄掠，不能安处，乃相率归附，誓守臣节，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穷，设福余、朵颜、泰宁三卫，授尔等官职，俾各领其众，臣属既久，后竟叛去。及朕即位，复遣使来朝，朕略其过，加意抚绥，数年以来生聚蕃息，朝廷于尔可为厚矣。比者尔为本雅失里所胁，掠我边卒，又遣苦列儿给云马市，实行窥伺。狡诈如此，罪奚可容……。”^②所谓数为鞑靼抄掠，是指受也速迭儿侵掠之事。可见早已叛走的兀良哈三卫不可能参加靖难之役。明成祖刚即位，三卫就数次侵犯明辽东广宁等地，被明军俘获多人，至永乐元年五月才被释放回卫^③。这也说明不存在所谓的报答关系，借兵之事似为子虚乌有，三卫的南下和分布也不是在永乐时期。那么兀良哈三卫是什么时候南下的呢？

（二）兀良哈三卫南迁的时间

对兀良哈三卫南迁的时间，一般都认为是在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以后，这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早于此时。但是在洪武、永乐年间仍在原地住牧，我们从三卫的贡道、马市的位置及明军对三卫的征讨等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朵颜卫同知脱儿豁察儿上书明廷说：“我等兀良罕林木中百姓，自国土的主、有洪福的成吉思汗的时

① 参见《明史》卷156，薛斌等本传。

② 《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十二月壬辰条。

③ 同上，建文四年八月己巳条，永乐元年二月己未条，五月乙未条。

分以来，额克多延温都儿、搠木连等地水自的行，到今不曾分离的上头，累朝将窝鹰土豹等物，年年尽力贡纳上都。今依大明洪福皇帝命，例由辽阳上送，地宽远的上头，来去年转远的上头，穷困百姓行，生受做了么，乞随地随便直上北平贡纳。”^① 这个要求当时是否被采纳不得而知，但是作为游猎于大兴安岭一带的朵颜卫人直接至北平朝贡显然更为方便。也说明三卫在洪武年间是经明辽东都司至南京朝贡，永乐初年，三卫的贡道似经北平至南京，如永乐二年（1404）三卫初次来贡，脱儿火察言“有马八百余匹留北京，愿易衣服。”^② 永乐五年，“朵颜卫头目把秃率妻子来朝，把秃自陈其母久居北京，乞往省视，命礼部赐之裘衣路费，令就居北京侍母，如欲俱还朵颜者听”^③。永乐十三年（1414）四月，“福余卫头目都赤，并可牙秃、彻彻秃等来朝，奏愿居北京”^④。北京曾是元朝的都城，对三卫人来讲比较熟悉，而且顺路，故有此请求。显然当时三卫的贡道是经北京（即当时的北平），而不是经辽东。

永乐六年（1408）三月，明成祖曾敕辽东，“阴阳家言，今岁海多暴风，自今鞑靼、女真野人朝贡者，皆令陆路来。”^⑤ 这里所说的鞑靼或许是指三卫中与女真相邻的福余卫人。同年四月，明成祖谓兵部：“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⑥ 此即后来的安乐、自在二州。所谓陆路是指当时经广宁入山海关的道路。而

《华夷译语》，卷下，涵芬楼秘籍本。

- ①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四月乙丑条。
② 同上，永乐五年二月戊戌条。
③ 同上，永乐十三年四月乙卯条。
④ 同上，永乐六年三月己巳条。
⑤ 同上，永乐六年四月乙酉条。

海路是指由辽东渡海，经山东登州去往南京的道路而言。而后者在洪武和永乐初年曾是辽东与内地人员往来和运输粮饷的主要通道，洪武年间由山海关至辽东的陆路未通，因此在洪武初曾相对于自辽东航海直达南京的海路称之为陆路，高丽使臣也走这条“陆路”，经辽东半岛渡海，于山东登州登陆，再走陆路去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后来因为元将纳哈出袭击明朝辽东的牛家庄码头，明廷怀疑是高丽使臣向北元泄露了机密，故不准其使臣再走此路，而令其走海路，即航海直达应天府。由于海路常遇风暴，高丽使臣多次遇难^①。这条“陆路”至少到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建都北京之前，仍是辽东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明朝都北京后，此路逐渐被由山海关至辽东的陆路交通所代替。随着辽东屯田的发展，海运也逐渐衰落。永乐四年（1406），明廷在辽东的广宁、开原为三卫开设马市二处^②。从开市地点来看，三卫的住地显然仍在北边，即东、西辽河之北，所以他们分入广宁、开原互市。再如永乐二十年（1422）明军北征阿鲁台返回时，在屈裂儿河（今内蒙古境内洮儿河支流归流河）一带征讨了兀良哈三卫^③，可见三卫慑于明成祖“五出三犁”之威，始终未敢近边，仍在原地住牧。但是，自明宣德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在战略上转入守势，为三卫逐渐南牧进入漠南地区创造了条件。

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明仁宗朱瞻基即位，十一月遣使诏谕兀良哈三卫，“许令改过自新，仍前朝贡，听往来生理。”^④第二年三卫来贡马，恢复了正常关系，同时开始了三卫南下游牧的进程。

① 郑麟趾：《高丽史》癸丑二十二年七月甲辰条，十一月壬寅条。

②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三月甲午条。

③ 同上，永乐二十年七月庚午条。

④ 《明仁宗实录》，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条。

宣德元年（1426）七月，明镇守蓟州山海等处都督佥事陈景先奏：“比巡边官至鲇鱼关，遇虏寇四十人，与战，败之，追杀殆尽，获其所乘马以归。……戒景先等毋贪小利。”^①此时朵颜等卫开始在明朝沿边活动。宣德二年七月丁未，奉命率军护送粮饷至开平的镇朔大将军阳武侯薛禄也对兀良哈三卫发动攻击。

《明宣宗实录》载：“是日，总兵官阳武侯薛禄、副总兵清平伯吴成率师至开平，虏寇先已逼城下，无所得而还。禄至，获寇三人询之，云虏众在朵儿班你儿兀之地，去东南三百里，禄等遂率精兵往袭之，昼伏夜行，三夕至其地，望见虏营，纵骑径薄之，虏仓惶上马迎敌，官军杀虏数十人，生擒贼首镇抚晃合帖木儿、百户忙哥撒儿等十二人，虏败走，获其男妇六十四人、马八百一十七匹、牛羊四千头。既还，虏众蹶其后，禄复纵兵奋击，又大败之，虏遂远遁。”^②距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境内）东南三百里的朵儿班你儿兀的位置当在老哈河上游一带地区。从其奔袭的距离和俘获人口、牲畜等来看，并不是来寇边的军队。而且被擒者还有明朝授予的官职，显然是靠近明边游牧的三卫部落，这是一起边将邀功的捣巢之举。明朝对朵颜等卫的捣巢袭击并没有就此而止。

宣德三年（1428）正月，明边将奏：“兀良哈三卫之人往往於滦河牧马，请掩袭之。”上曰：“虏犯边，当正其罪，今未有犯边，姑遣人谕之。”^③于是遣指挥佥事黄照化等前往谕之，敕其约束部落，毋得犯边。五月，朵颜卫指挥佥事猛哥帖木儿等人受黄照化等人招抚前来朝贡，受到明廷的赏赐^④。九月，明宣宗出

^① 《明宣宗实录》，宣德元年七月丁未条。

^② 同上，宣德二年七月丁未条。

^③ 同上，宣德三年正月丁未条。

^④ 同上，宣德三年五月丁巳条。

巡至喜峰口。据《明宣宗实录》记载，明守将遣人驰奏：“兀良哈之寇万众侵边，已入大宁，经会州及宽河。”明宣宗亲率侍卫出喜峰口四十里，至宽河（今瀑河下游），距“虏营”二十里，“虏”前来迎战，击之，“虏”溃走。又遣诸将搜捕捣巢^①。此役“……斩首万余级，擒其酋长百余人，径捣其巢穴，尽获其人口、兵器、马匹、牛羊辎重不可胜计，腥膻荡涤，边境肃清”^②。实际上此役是明宣宗以巡边的名义对南牧近边的兀良哈小部落发动的一次偷袭。其规模不大，宽河就在近边，其中搜捕捣巢的忠勇王金忠、都督把台等出边六日后携所获人畜返回，可知其出边不甚远，大约到了老哈河上游一带。宣宗所率侍卫不过三千骑，战绩也非捷报中所说的那样大。所谓“腥膻荡涤，边境肃清”只不过是虚文饰词而已。事实上，战前已遣黄照化等人前去招抚，探得其虚实，随后就发动了这次袭击。既归之却又讨之，纯系年轻皇帝在宦官怂恿下进行的炫耀武功的小把戏。明宣宗虽然南弃安南，北失开平，但是由于此役而得到了史家“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矣”的评价^③，而其结果则是宣宗始料所不及的。

明军刚刚班师，兀良哈随后就来报复。十月，袭击卢龙陈家庄，劫掠人口马牛；十一月，入广宁后屯卫杀掠；十二月，先后入广宁、义州等处杀掳人畜^④。紧接着第二年正月，边报开平西南有鞑寇十五成群往来出没。三月，“朵颜等卫头目完者帖木儿

① 《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九月辛亥条、乙卯条、壬戌条。

② 同上，宣德三年九月甲子条。

③ 《明史》卷9《宣宗本纪》。

④ 《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十月丙午条，十一月壬戌条，十二月甲子条。

等来朝贡马，上嘉其诚，宥其前过，凡家属被获者悉还之……”^①。同月，《明宣宗实录》记载：“先是兀良哈鞑寇余孽侵掠永平、山海，上欲亲率兵剿之，命（史）昭等八卫原选操随征官军赴京。至是兀良哈三卫大小头目亲来朝贡，上以虏既归诚，遂敕昭等各回卫备御。”^②表面上双方的关系似有所缓和，实际上朵颜等卫朝贡主要是为其被俘人口而来，三卫无故受到二次袭击岂肯善罢甘休。索回被俘人口之后，便开始报复，对明边频频袭击和抄掠。同年六月，先后入开平境内的赤城、独石等处杀掠人口。七月，又入宣府境内，杀守宣府神铎内官王冠，并杀千户陈琼等，掠牛马而去。八月，又杀宣府前卫出境采木军士，掠其所乘官马。十月，虏入雕鹗，杀官军掠人，又犯古北口东砖垛子口^③。宣德五年二月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猛古乃、歹都等奏云：“朵颜、泰守二卫所部近尝作过边境，臣等恐其貽累，故远避去。今蒙谕抚皆已复业，然虑彼作过者终将累良善，臣已遣人诘责劝诱，使改过自新，如其不悛，臣等请自击之。”^④可知上述被明军袭击以及侵扰明边的兀良哈部落主要是朵颜、泰宁二卫之人。

由于兀良哈不断侵扰，明廷不得不加强对蓟辽边境的防卫。为保护蓟辽间的通道，宣德五年（1430）正月，“置辽东宁远卫於汤池，凡五千户所，……其汤池上下六站，各增置一千户所。山海关东至高岭驿设广宁前屯卫，中前所沙河驿至东关驿设广宁中后所，杏山驿至小凌河驿设广宁中屯卫中左所，凌河驿至十三

① 《明宣宗实录》，宣德四年正月甲子、三月戊申条。

② 同上，宣德四年三月丁卯条。

③ 同上，宣德四年六月丁酉条、己亥条，七月丁卯条，八月乙丑条，十月辛丑条、乙丑条、戊辰条。

④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条